

《新华本草纲要》的 成书过程及其科学价值

——纪念吴征镒院士逝世一周年

李 恒

(1929~)，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岁月易逝，吴征镒先生驾鹤西去已经一年。在过去50余年的岁月中，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我有幸常随先生左右，聆听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师生之情，雨露之恩，难于言表。先生对植物学的贡献，有目共睹，先生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给科学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大量宝贵时间。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号召下，吴先生也遭受过无情的批斗和残酷的迫害。就在这荒诞、折磨人性的年代里，吴先生凭借他对科学的信念和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默默地，坚定地开创了“新华本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医药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3年8月，随同吴先生赴湘西考察

一、《新华本草纲要》的成书过程

《新华本草纲要》（简称《纲要》，下同）是一部全面介绍我国药用植物的纲要式专著。它的完成和出版是20世纪中国医药学的一件大事。

《纲要》从构思到出版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科学春天两个时期，前后20年。吴征镒先生“利用机会发挥一技之长，做了一点有用的事”。（吴征镒自述）。

《纲要》的系统分类编目始于科学事业被严重摧残、科学家遭受残酷迫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书出版于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下文是我关于《纲要》的一些回忆。

（一）《纲要》原始底本

《纲要》原始底本名为《华南及西南五省（川、滇、黔、桂、粤）中草药名汇编》（简称《五省中草药名汇编》，下同），唯一编著者是吴征镒。吴先生在没有自由的极端困难环境中完成了初稿编纂。《五省中草药名汇编》是用蓝色圆珠笔书写在400字/页的红格土淡黄色稿纸上，内容包括种子植物，从苏铁科到禾本科，基本按哈钦松系统排列，每



《新华本草纲要》手稿



种植物记载中文药名及其出处（历史）、拉丁学名、分布情况、药用部位等。此稿计88页，由于能用的参考书有限，初次记录多不完全，遗漏部分被写成长短不一的纸条（插页），置放在相关的页码之前，平均每页都有1~3个小插页，每页原稿加上插页大约3500字。此稿总计约为76.3万字。

此稿是在吴先生离开“牛棚”之后，白天被监督劳动，晚上可以回家的年月里（1968~1969年）写成的。这时，吴先生自身没有完全的自由，他的办公室被专案组占用，大部分书籍被践踏，他没有进图书室或标本室的权利，只有依靠留在家里的几部旧书来回翻阅，更主要是依靠他超人的记忆力和对中华民族医药学的责任感，开始了他又一理想的实现。

起初，这本五省中草药名录仅仅是一个提纲式的框架，大多数种只有一行：一个中草药名，加上一个学名，凭着自己的记忆，简述了分布和入药部位，如银杏科的白果：“1. 白果，银杏，公孙树，白果树（四川中药志2/44），*Ginkgo biloba* L.，五省均有栽培。药用：种子。”种间留有较宽的余地，供日后的补充和完善。现在，我们仍能拜读这一部字迹密密麻麻，历经多次编辑加工，内容丰富的手稿，它向我们提示，在恐怖荒唐的年代里，先生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在努力实现他的科学理想。

（二）《纲要》原稿的策划

1970年，吴先生的“历史问题基本弄清楚，但还未‘解放’，被分去烧开水炉”（自述）。工纠队对他的管制有所放松，烧开水的工作比较固定，“劳动之余”可以在锅炉旁公开看书写笔记，和同志们说话交流也有了机会。这时，他对武素功吐露了订正各地中草药名称的设想，出示了部分《五省中草药名汇编》手稿，计划扩充和提高。武素功、杨崇仁和我都表示大力支持，主动向他提供已经出版的各种中草药图鉴、手册和方剂，大家还拟定了保全这部手稿安全的措施。

（三）走进中医中药展览会

随着中草药运动的开展，云南中医学院举办了一次云南中医中药展览会，杨崇仁和我参加部分展览工作。展览会上展品丰富，内容五花八门，大量的民间医药方剂和药品实物展现出来，既有标本，又有用法和病例。展品按药物的性味功能分类陈列，但美中不足，展出的药物没有科属位置和植物学名。应展览会组委会的邀请，通过组织协商，吴先生在造反派的押送和监督下，走进了中医中药展览会。这时，他高兴不已，他注意到许多使他长期困惑的古籍本草，今天得到了答案。凭借他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惊人的速记技巧，在短短的数小时内，他记录了几个展览室的全部药物标本的名称、功能、产地和用药医生，随即写上每种植物的学名。吴先生揣着几页展览笔记回到了烧开水的岗位上，长时保持着参观展览的喜悦。“文化大革命”以来，吴先生第一次享受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真谛。参观中医中药展览后，进一步加深吴先生为祖国医药宝库添砖增瓦的民族责任感。

（四）《纲要》新稿的形式和内容

《五省中草药名汇编》的扩编和改编工作开始了，当时的文稿名并不确定，或称“全国中草药名录”，或叫“新华本草名录汇编”（写有文稿名称的原稿首页和P.1~35页在编写《纲要》时分发给有关作者参考，至今没有交回）。内容大大扩充：区域范围从五省扩大到全中国，文献引证范围从先秦的《名医别录》《诗经》，一直延伸到当代各省、区、地、市的形形色色的中草药资料、标本以及个别民间草医的行医经验，还包括全国植物志、各地方植物志、经济植物志，系统范围从原来的种子植物药扩大到包括菌、藻、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涵盖整个植物界的门类。此稿蕨类按秦仁昌系统，裸子植物按郑万钧系统，被子植物仍然按哈钦松系统排列；每种编写顺序为：种序



号，中文药名（列举出处及页码，图号，有的种多达30种文献），别名（出处），学名，分布（到省），药用部位，功能和用法等7项。各种篇幅不一，少则1~2行，多的可有15~20行，达1000~1500字。编写框架确定了，收集资料和编纂仍然是一个艰苦过程。

（五）《纲要》复写稿的产生

那时，对当权派的批斗基本停止，昆明植物所除浦代英、吴征镒等少数当权派外，大多数受到冲击的普通群众都已走出牛棚，可以正常“抓革命，促生产”。武素功充当了《纲要》编写过程的联络人，他负责将我们收集到的各地中草药手册、图鉴交给在开水房劳动的吴先生，吴先生将每本资料的植物名称逐一订正，写上学名，同时补充到新稿中。另一任务是每隔1~2天，拿回吴先生订正过的中草药书及他完成的新稿（1~2页）。由于1970年的政治形势仍不稳定，吴先生随时有被抄家、被批斗，及其手稿被没收销毁的可能，我们确定制作新稿的复印本。武素功拿来的新稿交杨崇仁和我进行转抄（复写4份，复写稿由吴先生、武素功、杨崇仁和我分别保存）。留在吴先生手边的复写稿，每科都陆续得到补充，因而现存的复写稿又变得密密麻麻了。复写稿包括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木兰科至萝藦科。大约是1972年春，吴先生恢复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上了生产组组长，他的一切科研工作基本正常化，《纲要》的编纂已经公开，他的手稿基本安全了，复写工作随即停止，因此复写本缺失232（茜草科）~332（禾本科），由我秘密保存的手稿（原稿）也名正言顺地放到了吴先生办公室的档案柜中了。

在此期间，吴先生接触到的中草药书在100种以上，每种收载中草药200~500种不等。仅云南就有：《迪庆藏药》（上、下册）、《昆明民间常用草药》《丽江常见中草药手册》（第一集）、《曲靖专区中草药手册》《文山中草药》《元江哈尼族药》《云南思茅中草药选》《云南中草药》《云南中草药选》（续集）、《玉溪中草药》等10余种，大都是图鉴，有的还是彩色图鉴。吴先生工作量大，很忙，但很愉快，烧开水也成了他的乐趣。大约在一年的时间里，吴先生以惊人的高



《新华本草纲要》手稿



《新华本草纲要》复写稿上有很多吴先生的补充



效率完成了《纲要》原稿的编纂工作，此稿共计6000余种，975,660字。留在他手边的复写稿计218页，全部约763,000字。

《五省中草药名汇编》、《新华本草》原稿、《新华本草》复写稿三稿总计2116,260字。这就是吴先生自己说的“整理记录了各地中草药植物的四大本笔记”，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文化荒芜的“文革”年代辛勤耕耘的结果。

此外，受《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组长谢宗万教授的委托，吴先生审校了本书的全部草稿（2200种），《汇编》的有关内容也被添加在《纲要》原稿中。

（六）《纲要》的编写和出版

1972年，吴先生恢复工作，担任了生产组组长（计划处处长），他以马鞭草科为例，培养我们编写《云南植物志》和《云南经济植物》，又亲自编写了拉丁文讲义，为我们开拉丁课。但在业务上，这位组长的决策权却十分有限，以致《纲要》长期无法出版。有一天，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肖培根专程来拜访吴先生，讨论中国医药学宝库问题，吴先生谈到自己新近编写的“中草药笔记”。肖培根一见此稿，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当即表示尽快刊印，准备带回北京。时任资料室主任，昔日的生产组组长潘以祥见势不妙，立即出面制止，要回了手稿，叮嘱吴先生妥为保存。潘以祥出于本能，认为这是昆明植物所的科研成果，应当由昆明植物所，而不是医学科学院出版发行。但潘以祥也不是植物所的主要决策人，《纲要》草稿在昆明植物所封尘多年，并未提上出版日程。

直到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科学的春天”来临，吴先生以革命委员会主任、所长的身份主持昆明植物所的工作。这些年，吴先生除主持昆明植物所的工作外，同时担任《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三大巨著主编的重任，还是学报《云南植物研究》的主编，十分繁忙。他意识到，《纲要》必须依靠全国的医药研究力量才能完成。经过几年的提议和酝酿，江苏省植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纲要》的编写出版问题达成了合作协议，集中了全国有关医药学、本草学、植物学、植物化学等方面的科研力量，成立了包括19人的编委会，确定吴征镒任主编，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肖培根和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周太炎为副主编，聘请了中医中药学家叶桔泉（院士，中国药科大学一级教授）、生药学家李承祜（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生药学家徐国钧（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教授）、生药学家楼之岑（院士，北京医学院教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顾问）为顾问，此外，还聘请了本草学专家陈重明（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专家唐世蓉（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等8位担任助理编辑。许多组织工作和出版工作均由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承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出版。组织工作基本就绪。

1981年，《纲要》的编写工作正式开始。主编首先构思了书名和体例，书写了前言。在前言中，吴先生期待“本书在性质上和前述先驱著作略有不同，侧重在加以提高这一步，力求为探索和发掘新药源，从已有资料的消化整理中获得一些启示”。关于本书编写体例，吴先生声明：“关于植物形态描述和绘图，因已有珠玉在前，就概以省略”，他同时强调“而关于药用植物种类的历史源流和近代关于有效成分的分析鉴定，则力求贴切和详尽”。

《纲要》编写的依据主要是吴先生的《新华本草》原稿，在吴先生的自述中叫做“中草药笔记”，内容增加了“成分”一节。由于每种药用植物需要写出有效成分，本书每个科的编写都是由植物分类学家和植物化学专家合作完成，其中“历史”“成分”和“功效”部分均需相关专家再三



审阅。主编除关注全部植物学名外，还要审阅修正全文的大小错误。每册在交付出版前，都要组织1~2次编委扩大会议，自审，互审，专家评审。第一册的出版先后经历了7个年头。

1988年，《纲要》第一册出版了。药学界、植物学界欢欣鼓舞。不到一年，6100本书已全部售出。1990年《纲要》第三册出版，1991年《纲要》第二册出版。至此，吴先生的理想，从《五省中草药名汇编》到《新华本草纲要》的编撰和出版完全实现。

二、《纲要》的科学意义

1988年《纲要》第一册出版，谢宗万先生于1989年作出了评价：“这是一部精简、扼要、实用、系统地介绍我国药用植物的纲要式的专著。”他认为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一）收载品种的数目是迄今出版的中草药类书籍中最多的一部；（二）科前的小总论，突出了全科药用植物的种类、成分和疗效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三）植物学名的审订精确可靠；（四）药用历史的阐述，是中药品种考证的结晶；（五）化学成分的记载，内容新而翔实。最后，谢宗万说：“总之，《新华本草纲要》是一部好书，是对于与药用植物有关的医疗、生产、教学等方面都有一参考价值的书，特别对中药科研寻找新药以广开药源大有用处。”

1992年，《纲要》三册出齐，1993年，尚志钧（中医史学专家，本草文献学专家和本草文献整理研究奠基者）和他的弟子刘晓龙，再次评价了《纲要》，现摘录如下：“《新华本草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由江苏省植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记录我国植物药的纲要性专著，全书共分为三册，收载我国产的各类药用植物约6000种，是我国有史以来记载植物药最多的药学文献。该书简明扼要，编排新颖，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纲要》编写突破了旧式以笔画、性味功用、药用部位等分类方法，而采用了植物进化的系统分类编排，这种编写体例不仅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觉，而且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植物药的资源、分布情况，对认识和研究同科、同属药物，利用亲缘关系寻找新药资源都很有裨益。按植物系统编排，还有助于读者区别同科、同属中的近似药物品种。这种编写体例，弥补了过去出版的所有本草和药学文献的不足。《纲要》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比较全面地摘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历史”栏目编写的很有特色，这对读者了解药物的起源、延续、变迁颇有指导作用。”



尚志钧在评价本书科学价值的同时，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最主要的问题是：“三本《纲要》共遗漏了7个科约60种药用植物，它们是：景天科Crassulaceae（27种），漆树科Anacardiaceae（15种），桦木科Betulaceae（8种），使君子科Combretaceae（5种），茶茱萸科Icacinaceae（3种），山榄科Sapotaceae（1种），草海桐科Goodeniaceae（1种）。遗漏的药物中，有些是《中国药典》收载的常用药，如：使君子、柯子、垂盆草、干漆等。为了弥补不足，建议编者能将脱漏的植物药进行补遗。”

大约在1993年，杨竞生先生为三册《纲要》编写了《科序目录》《中文科名索引（笔画序）》和《拉丁科名索引》，也已发现种子植物一些遗漏的科。其索引手稿保存在吴先生的《纲目》书

中，我有一份复印稿。如果补遗，建议将杨竞生的3个索引一起排印。

三、后续工作

吴先生有言在先，他在“前言”中写道：“由于编者们的学习水平所限，也由于客观条件的不足，不可避免有选择不当，考订不严，叙述不周或内容不够详实，应用上不方便的缺点，希望读者不吝指教，随时斧正，以便今后创造条件加以改订。”《纲要》的后续工作主要将是遗漏科属的补遗和错误之处的改正。

注：本文中（自述）指吴先生在《百兼杂感随忆》（2008年）中的《九十自述》；“前言”是引自吴先生的手稿《前言》，其文字与在《新华本草纲要》第一册中印出的《前言》有些不同。

